

娜娘摘珍

春晖满城堪记取

——聂耳的初恋(下)

郑千山



对于恋爱、结婚、实现理想这些事，的确让年轻的聂耳很纠结，当天，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marriagegrave(结婚就是坟墓)”，聂耳想的是远大的理想。

1930年7月初，19岁的聂耳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。因他在校参加学生运动被人出卖，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，于是决定于7月10日离开昆明，顶替他三哥聂叙伦到上海的“云丰申庄”去当店员。决定出走之前，聂耳约袁春晖在玫瑰田边见面，倾诉爱情，描摹理想，聂耳说，将来做一番事业后，一定会回来娶袁春晖的。两个人在依依惜别中度过，但当时，他们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一次见面，竟然会成了永别！

到了上海，聂耳一直挂念着在昆明的“小三晖”，他给袁春晖写信，也给张庚侯写信，随时关注着袁春晖的情况，当得知袁春晖在昆明第五小学教书并开始有微薄收入了，他十分高兴；他曾写信给袁春晖说，自己已积攒了一笔钱以后，要把她接到上海学习音乐，不要让她的音乐才华白白浪费了；他从袁春晖那里要来的干编桂花，一直带在身边，夹在书中，因为一嗅到编桂花的清香，他就会想起袁春晖——小三晖、“吹吹灰”，想起美丽的昆明故乡……

在上海，聂耳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从“云丰申庄”离职，考入明月歌剧社，又离职，到北京找工作，重回上海，就职“联华”，再离职，进“百代”唱片公司，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聂耳在追寻梦想的人生轨道上前行，但他始终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恋人袁春晖。两个人鸿雁传书，倾吐思念，有时还寄上彼此需要的东西。聂耳还给春晖“小舅”张庚侯“张二哥”写信，从旁了解袁春晖的情况。这几年，聂耳在上海和北京，几次见到了春晖的好友陈炉、表妹李家珍，见到了彼此的好友廖伯民，甚至有一次，他居然在上海碰到了逃婚出来的袁春晖姐姐袁令晖夫妇……然而，对于与袁春晖的婚姻问题，他始终没有下决心解决。他深爱着他的“吹吹灰”，却又一直纠结着，该怎样处理与她的关系，他在1932年的日记中写道：

二月二十八日。很想念“三人”，前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是多么快乐地玩。

四月六日。想到“三人”，当然很够回味。

五月三日，不写“三人”的信，总觉心不安。也只是有心写了她的一封，别的再也提不起兴趣来写。

五月十七日，说到真正的能同走一条路，同一思想行动，还是我的“三人”好。好久没有接她的信，不知她还是以

前的思想吗？今晚接由上海转来的她的信，安慰了许多。

六月十五日，昨晚三点钟才睡，给“三人”写信，要她勇敢地出来。

六月二十八日，接母亲亲笔写来的信，她谈到我的婚姻问题，她想去问问“三人”家。

这里的“三人”指的正是袁春晖。

恋 爱 中

的彼此都是敏感而多愁的，聂耳与袁春晖也不例外。聂耳在上海明月歌剧社和联华影业公司工作期间，和一些女演员相处得很好。因为他个性开朗活泼，又乐于助人，所以他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充满了欢声笑语，“耳朵先生”是一个“开心果”。但一些上海娱乐小报开始“八卦”了，把女演员王人美说成是聂耳的女朋友，还登了照片。张庚侯看到后写信来问，聂耳回信说：

“二哥！用不着秘密！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可秘密的地方，听我细细道来吧。我叫她：‘德来西士特尔(Dry sister, 即干姐姐)’，她叫我：‘德来不拉凡(Dry brother, 即干弟弟)’。由此，你可以看出我们是怎样一个关系！干姐弟也。她待我和她的弟弟一样，而我也仅觉得她像我的姐姐。……她和我毫无拘束地谈、笑、打架、吵嘴、翻脸、讲和，一块儿看电影，一块儿吃饭，这便是我们的最高友谊。”

“我希望你有好些事不必神经过敏。老实说，我现在所爱的人只有小三晖(袁春晖)。我不管她怎样‘人心大’，‘用情不专’等语，我总觉得她也一样地爱着我。”

张庚侯在一封给聂耳的书信中不经意地提到：最近袁春晖与聂耳的一位朋友李英若走得比较近，关系比较亲密，聂耳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：“接你的信，提到春和英的一点闲话，我看了很多次会起作用，这不是和她隔离了这么多年而冷淡的缘故，实在是我深信她绝不会有十分过火的行动。我想她也是一样

地相信我才能这样，在她，不见得是件稀奇事的。”虽然这么说，其实聂耳是十分在乎的，他因为这件事而心情不好，以至于没有去参加当天晚上“联华”组织的隆重的圣诞晚会。

聂耳一生给女友袁春晖写过上百封信，光从现存的《聂耳日记》中可以见到的聂耳

与袁春晖通信的记录，就有近20通，可惜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日本飞机轰炸昆明，袁春晖一直珍藏的聂耳书信以及聂耳赠她的“皮四狗”玩具，都在轰炸中被毁。如果这些信件能幸存至今，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这对恋人更加生动的恋爱故事。

1933年初，22岁的聂耳在白色恐怖最严重、斗争最尖锐的时期，经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赵铭彝、田汉介绍，“左联”负责人夏衍监督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从此，他每天忙于音乐学习与创作，忙革命工作，一支支革命歌曲诞生，聂耳还扮演了不少左翼电影中的各种角色，几乎没有时间来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了。

然而，革命青年的聂耳依然在心中保留着袁春晖的位置，1934年11月24日，他在给张庚侯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关于莺的问题，根本不是一个问

题……1. 我觉得莺是最了解我的一个。

她知道，我们过去的恋爱完全是建筑在思想上面的，我们虽然离开四五

年了，虽然断绝音信一二年了，但是假如

我们的思想仍是一致的，相互间个性的

了解仍是如从前一样，当然，我们还有

继续恋爱下去的可能。2. 在从前，她和我

都有着同一个恋爱观念，至于你要鼓吹

订婚或结婚，我想还不是急于要解决的

事，是不是你也希望我很快地去做‘子

女的忠实牛马’……”

其实，在写这封信的同时，袁春晖

那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对此，张庚侯应该还是比较明白的，只是，他很

想看到的是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。爱情的理想与现实往往落差很大。聂耳与袁春晖的爱情关系，尽管袁春晖从未向家长正式讲过，但家长还是知道的，从“门当户对”的旧观念出发，她的母亲，从一开始就对此一直持有异议。只是由于袁春晖的坚持，她母亲没有办法。袁春晖的姐姐袁令晖几年前的婚姻，也受到了母亲的干涉，非要她嫁给云南石屏县的一个富商子弟，袁令晖坚决不从，最后与心上人双双离家出走，去了省外。对于聂耳与袁春晖，既然袁春晖坚持，母亲和家人也不敢太加干涉，否则又要出一次“袁令晖事件”。

但到了1934年冬天，聂耳与袁春晖的恋爱关系却迟迟没能确定下来。整日为革命而奔忙的聂耳又如同断线的风筝，一直千里迢迢在外飘荡，几年没有音讯，不知何日才是归期？最后，袁春晖只好屈服于家长的意志，与一个进步的青年商人结了婚。

袁春晖结婚的消息还是让聂耳知道了，他很痛苦。但也只能把这份情感深深地埋在心底，他把当年从袁春晖那里的干编桂花一直珍藏在自己身边，直到一年后他不幸在日本鸽沼海遇难，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，还发现了不少他从昆明带来的干编桂花瓣，那些花瓣清香依旧……

聂耳的骨灰被带回昆明，安葬在他生前非常喜欢的西山上，那一年，新婚不久的袁春晖参加了安葬仪式，自己曾经的恋人成为了享誉国内的青年音乐家，她的心中是充满自豪的。命运多舛，袁春晖的丈夫，一位进步的工商业者，在1957年被错划了右派，1967年遭浩劫被迫害致死，几经磨难，袁春晖也成为了一位疾病缠身的老人。1978年，西山聂耳墓举行拜谒典礼，袁春晖与聂耳的三哥聂叙伦、聂耳的生前好友都应邀出席了典礼。

1985年10月，首部《聂耳全集》在北京出版发行，听闻袁春晖还健在，云南省歌舞团团长、著名导演徐演专程赶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拜访她。年已73岁、满头白发、双目失明的袁春晖老人躺在病床上，当讲起聂耳，她仍然非常激动，她讲起了当年与聂耳同演《雷雨》的往事，那时，安排聂耳演鲁贵，聂耳是去请袁春晖出演四凤，袁春晖不乐意，他对聂耳说：“我才不和你演这个隔阂辈分的角色哩，要演，就演我们俩般配的角色！”老人说，这是一段她发自内心的真实表白，那个时候，聂耳的脸红了起来，他低下头笑了起来，笑了起来……

云岭阅读

无边山河足底生

——胡正刚《南山行》读后

尹明松



立“红河源碑”后，柴枫子从红河源头启程，沿着红河干流进行了一次全程徒步，在行走中升华提升了生命。胡正刚也是一位旅行者，他用诚挚的行走和写作向前辈致敬，数次走完了全长70公里的红河巍山段（西河），不断接近西河的内核，感知西河的气息。

《热血吟》同样可以视为胡正刚对先辈的致敬，是他朝着写作对象内心世界跋涉的一次精神之旅。陈佐才情操高洁，既是明末孤臣，又是遗民、隐士和诗人，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游移不定，是一名视死如归的勇士。《热血吟》最大限度地还原了陈佐才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，厚重而丰饶。

作者经由具体的创作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，这种塑造是客观与虚构相互交融的结果，显现出作者对外部世界的观照和内心世界的审视。胡正刚在巍山驻村两年，亲身参与了生活现场，他认真选取和处理文学素材，严格恪守文学标准尺度。他在后记中坦言：“我的写作对象都曾进入过我的内心，并引发过我内心的震颤。”

为了感知人世起伏，他一次次与村民促膝长谈。《驻村记》是作者对现实题材进行文学化处理的探索，他以所见所闻的人物和事件为素材，人物形象真实饱满，立体可感。为了探究河流始末，他耐心查阅文献，沿着河流深入山、出邻县，在《西河志》中随处可见翔实的史料和作者切身的感受。史实与传说辉映，现实和历史交融，一条富于自然和人文气息的红色大河如在眼前。为了梳理陈佐才的人生经历，深入其精神世界，他不仅熟读陈氏诗文，而且多次探访其生前的隐居地是何庵和死后所葬的石棺墓，采访陈氏族裔，收集了大量素材。

胡正刚长期坚持诗歌和散文创作，语言敏锐而富有张力，他将写作对象浸润在饱含深情的文字中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。阅读《南山行》，可以藉由文字走进胡正刚胸中的山水和人世，亦会邂逅一位苦心求索的行者。

书人书事

在民族文学领域深耕

——怀念哈尼族作家存文学

温星



曾任昆明市文联兼职副主席、市作协副主席、昆明文学院院长的著名哈尼族作家存文学先生，11月3日晚，突因中耳炎引发颅内感染不幸在昆明去世，享年70岁。面对他创作的《碧洛雪山》《望天树》《众神隐退》《蓝色山谷》《阿佤山》以及《兽灵》6部长篇小说和诸多电影文学、报告文学作品，我不禁感觉到深深的震惊和悲伤。

我最早读到的存文学鲜明而又强烈的小说，是《碧洛雪山》。雪山脚下与世隔绝的麦地村居民，认为自己是黑熊的后人，因此，崇拜供奉经常来村里觅食捣乱的大黑熊，由此，人熊之间就发生了很多故事——自然、和谐之美之故事，也有冲突剧痛之事故。小说主体情节并不复杂，但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，独特的自然风光、民俗风情、人与大自然的冲突，村民生活的艰辛、无奈与挣扎，在存文学充满毛茸茸质感的笔法中不断推进。

这部创作于近20年前的作品，已然对当下文坛较为热门的一大题材，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的“易地搬迁”进行了一番深刻的书写，可谓具有前瞻性。

小说《碧洛雪山》翻译出版后，在海外颇受关注，而作为存文学首次担任编剧、改编拍摄的电影《碧洛雪山》(与小说名相异一字)，在2010年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，评委会主席吴宇森观影后赞叹连连，多次落泪。这恐怕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史上“最土”的一部大奖作品，演员全都是原著中“雪山孤村”的村民，全文盲，也全都不懂汉语，直接操民族方言入戏。跟主演一起受邀参加电影节并走红毯的存文学，同样是一副“云南老农民”的模样。

自甘寂寞的存文学，就这样，在寂寞的领域持续深耕着，他的《蓝色山谷》《阿佤山》《神秘的黑森林》《兽之谷》《望天树》等系列小说，题材与价值指向，无不深度关切少数民族的发展命运、自然人文生态以及“人与自然”之间的冲突与救赎。看似都是宏大主题，他的切入点却无不具象而又细微，细微到钻入大山深处

每一个小人物的内心深处，细微到沉入每一条河流奔涌的暗流底部，细微到侵入森林中每一种动物的掌印和植物根系末梢。存文学的文学特质与品质，我认为，是典型的生态文学、博物写作。

2020年1月12日，在诸多民进文化人的扶持与参与下，民进昆明开明文学院在昆明成立，当天，吉狄马加、贾平凹、马原、徐剑、徐则臣、刘醒龙等“文坛大咖”纷纷发来贺电，祝贺这项云南文学界诞生的“新生事物”，希望文学院能够担当起扶持边疆地区文学文化事业的大义。

向来率性散漫的存文学，当天破天荒地穿了一身西服——这天，对他而言，确实是一个大日子，退休多年的他，当选首任文学院院长，他真想在这个平台上，为昆滇社会的文化建设尽一份力，也为本土的文学版图增砖添瓦，甚至，还想把本土优秀的和有潜质的文学人才发掘出来。尽管成立近三年来，因新冠肺炎疫情且活动经费拮据，但文学院还是联合相关部门和社会机构，举办了近百场各类读书及文化活动，很好地助推了昆滇社会的文化氛围，尤其是阅读氛围；邀请作家们共同创作记录中国“铜都”东川近年深刻变迁的《乡村传》，“开明作家群”也渐渐崭露头角。

我明白，存老是多么用心地想要将“开明文学”这个平台做大做强，但他自己的创作也一点都没落下。今年初，他受广西方面邀请，去蹲点创作一个多月，拿出一个全新的电影剧本。那日凌晨，他打来电话，熬夜熬眼的嗓音依然不改高亢，他说他的剧本终于修改、验收完毕，我作为编剧的工作杀青了，我明早就赶回云南！

9月份，存文学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了全新长篇力作《众神隐退》，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单行本，10月，《碧洛雪山》《兽灵》等三大册经典旧作再版，我们正准备为他举办《众神隐退》首发式暨存文学创作40周年研讨会，而他却突然撒手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文学，这不能不让我们文学的同仁感到遗憾，愿存老在天堂永远与文学同在！

书香云南

书写佤山风情 吟咏民族情谊

——读历史小说《七日》

李奕扬

上一碗，米香扑鼻……

对风物、陈设、习俗等细节的反复铺陈，缩短了读者与神秘民族文化的距离，使符号化的文化遗产瞬时鲜活起来。原始的自然风光呼应着朴拙的生活图景，奠定了全书的基调，也为随后故事的展开绘好了底色。在景物的点缀之间，情节渐次展开；一碗茶香贯穿首尾：是旧情谊，是生死局，是患难情，是信念的传承。大幕缓缓拉开，人物走上前台。

述人：活的灵魂

灵动的人物刻画，足见作者文字驾驭之功，也使整部作品富于生气，隽永而易读。

李保腰佩银刀，不怒自威。他是族人心中无可替代的西盟土司代办，多年守护一方平安。故事里的他总低低笑着，目光炯炯。敌人惧他、家人护他、族人敬他。邪祟躲不过他的眼睛、危难拦不住他的勇武，然而，便是他少时救下的同族兄弟，在利益的蛊惑下使他折戟。

“这世上的骗术，并不在于骗子的话有多高明，而是在于被骗的那个人，他愿意相信你，才会被你骗。”——故事的开头，李保缓缓道。一语成谶，定格下错综命运里的悲剧。在被困以至罹难的七个日夜里，折磨、凌辱、利诱、威胁轮番上阵，他曾疑虑，却始终没有低头。作者借由他叙，使读者自李保周边之人获知李保其人，将李保的睿智、温良、勇毅巧妙地隐于其心腹，爱人、族人的故事中，娓娓道来，却十分吸引人。

拉勐虎背熊腰，翘起的胡子下满是开怀。不同于李保略带神秘感的人物叙事，作者对拉勐的描绘采用的则是直笔铺陈。作为佤族部落的大头人，他以智慧化解干戈，细致地维持着佤寨的和平与繁荣。他是佤族的勇士，是温柔的父亲，也是谨慎保守的头领。面对古老的传统和风俗，他在思想的斗争中超越了传统，接纳了党的邀请，跨出了佤山，走向了北京。在拉勐的世界里，反差与冲突是一组重要的性格构成。传统与新生之间横着一场激烈的心理斗争，也形成

融情：一壶老酒

“敬今晚垂落的月亮。”

“敬明天照常升起的太阳。”

李保罹难前，曾忆及少时与父亲的对话。彼时的温暖与意气风发，此刻已化作绝望与无限辛酸。闪现的一幕，简单的对话，暗示了人物的结局，也承托起人物复杂的情绪。这是我尤其喜欢的

木鼓余音

云南的故事与传奇不少。尤其近代以来，这片土地涌现出诸多仁人志士，他们深度参与到国家变革之中，投身于民族危难之际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。而稍显遗憾的是，关于这些历史片段、精彩故事的挖掘和表现，总归寥寥。小说《七日》将历史的片段具化还原为一幅幅切近的生活图景，使历史中的人物跃然纸上，不再枯燥或板起面孔，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读者与书中人物的隔膜，缩短了当下与历史时空的距离，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尝试。美中不足者，在有限的篇幅内，《七日》将代表不同民族、不同阵营的5组人物置入较短的时间轴中穿插描述，稍显局促，略微有损于故事精神内核的深化与传达。